

从PMI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张 锐



近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5月份国内制造业PMI为51.9%，高出上月和上年同期0.5个和0.7个百分点，且为2017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点，表明我国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尽管如此，我国制造业结构性失衡依然较为明显，维系PMI曲线持续上扬仍需要外部环境持续改善与政策的持续赋能。

首先，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价格站上3年以来高位的影响，5月份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升至56.7%和53.2%，尤其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5月份国内制造业PMI表明，我国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维系PMI曲线上扬的良好势头，下一步仍需要外部环境持续改善与政策的持续赋能。对企业来说，应提前做好出口市场多元化开拓的准备，同时宏观政策也要给予企业超前性引导

压延加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高于60.0%。这说明，上游原材料与燃料价格上涨带给我国制造业成本的风险正在上升，成本压力依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继续降低税费予以对冲消解。另外，成本上升带动了终端产品价格上涨，这表明高耗能行业景气度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由涨价因素引起，并非完全由自身结构调整所致。因此，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绝不可因某些指数向好而终止。

其次，从企业规模看，5月份大、中型企业PMI为53.1%和51.0%，但小型企业PMI为49.6%，在临界点以下，表

明制造业小型企业面临着经营上的困难，扩张动能并不十分充足。由于小型企业是就业的主要载体，受到PMI指数回落的影响，整个制造业5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也走到临界点之下。下一步应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对小型企业的扶持作用，加大对小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再次，5月份反映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为40.1%，连续3个月上升，显示企业融资瓶颈仍待进一步缓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增强。虽然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实施两次定向降准，但依然没有解决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仅以债券市场为例，最近一个月主体评级AAA的6个月期信用

债利率上行近40个基点，评级差一些的企业融资更是难上加难。眼下，央行每日公开市场操作只是提供短期流动性，中长期流动性缺口仍然存在。因此，去杠杆力度需要把握得当，为企业留出一定的缓冲期。

最后，5月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均处在临界点之上，而且双双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说明制造业进出口并没有受到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但外贸行业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此，相关企业应提前做好出口市场多元化开拓的准备，宏观政策也要给予企业超前性引导，力争将相关风险冲击降到最低。

扶贫公示牌应挂在心上

斯涵涵

为突出对脱贫工作的重视，更好地落实对贫困户的帮扶责任，许多地方在贫困户家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扶贫公示牌”“脱贫帮扶信息公示”等牌子，详细标明了贫困户姓名、致贫原因、收入水平、帮扶责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扶贫公示牌”尽管有着夯实扶贫责任、保证扶贫资金发放公正公开的良好初衷，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姓名、电话、收入、致贫原因等全部呈现，无意中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二是在贫困户家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上扶贫公示牌，可能会让贫困户自觉“矮人一截”，极易挫伤他们脱贫致富的斗志和信心。

从这个角度说，公示接受帮扶的贫困户信息，固然是杜绝腐败，保障扶贫工作专业化、透明化的渠道，但如何拿捏得当，勿使贫困户“侵隐私”“伤自尊”，采用何种方式来公示，值得基层

部门认真思考。

具体来说，在开展扶贫相关工作时，要尊重受助群体内心真实感受，要物质救助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帮助其感受社会温暖，树立生活信心及致富斗志，真正达到扶危济困的目的。针对目前一些地区贫困户信息公示不及时、时间短、不规范等问题，政府部门要协同作战，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信息比对系统，建立健全低保资金的监管体系，明确资金的使用范围、对象、申报程序和补贴标准等条件，为准确、高效、公正认定低保对象提供信息支持。

总之，“扶贫公示牌”应挂在心上，而不是在“形”上。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既要实现阳光救助，也要把工作做实做细做“暖”，不断加大贫困信息规范化管理力度，找准接受社会监督和保护当事人隐私之间的平衡点，让每一个贫困户切实感受到来自政策的温暖。

给废旧家电一个合理去处

杨玉龙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电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废弃的家电，一扔了之令人心疼，不扔又占用空间。很多消费者由于不了解回收渠道，选择把废旧家电卖给不具备专业处理能力的小商贩，使大量废旧家电产品无法进入正规回收渠道。

按照规定，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必须由专门的回收企业来处理，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废弃电子产品增量巨大，另一方面正规的回收企业收不到废家电。旧家电含有许多塑料、橡胶、玻璃等可供回收的再生资源，还有的废旧电子产品含有金、银、铜等贵金属，对其处置不规范不科学，不仅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更有可能给环境造成一定影

响。因此，给废旧家电一个合理的“出口”，迫在眉睫。

破解废旧家电回收难题，一是要完善政策支持。从正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目前经营状况看，对废旧家电无害化处理成本很高，仅靠企业的责任心远远不够，这就需要通过绿色金融、绿色采购、税收优惠、荣誉奖励等激励政策来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二是增强社会参与意识。相关部门应加强废旧家电处理知识的普及，引导公众掌握科学处理废旧家电的方法。当前，许多电商企业、二手交易平台等，利用互联网渠道和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便利、高效、绿色的二手家电回收服务，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徐 骏作（新华社发）

重拳打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10起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规范、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司法功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日常生活中，由于青少年心智发育不成熟，识别风险、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相对薄弱，这一群体更容易成为网络违法犯罪的侵害对象。面对侵害青少年权益案件多发的严峻现实，只有打防结合，才能正本清源。为此，相关职能部门应有针对性完善司法政策，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治理合力，为净化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少受、不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时 锋）

不应忽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乔金亮

今年以来，不少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将公平公正的美好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笔者认为，在新型城镇化的形势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忽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应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配套政策方面全面跟进，让已经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留得安心。

当前，不少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普遍面临人才短缺的困扰。城市为了可持续发展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并给人才叠加福利，说明已意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开放的城市一定比封闭的城市更有发展前途。不过，城市选择发展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绝不意味着就不发展普通服务业，不重视农民工群体。因为，一座城市如同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是不可或缺的，城市容量越大，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多样化。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籍背后附加了较多的隐性福利，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等诸多方面。大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尽管对城市发展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无法享有与户籍人口一样的权益。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以此拉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序幕。此后中央又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这1亿人是现在城市里的“存量”，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已经适应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农民工群体。

从人口红利角度看，农民工群体蕴含着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动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数以亿计农民

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历程，由此创造了数倍于过去的产出。当前，农民工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性不足并存，由此导致不少地方出现农民工荒，供过于求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地政府应拿出与招商引资、招贤纳士一样的热情，更加尊重和呵护农民工。比如，深圳就对无高学历的普通农民工给予更开放的政策，通过户籍与培训双重激励，引导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走蓝领及高级蓝领路线，以融入深圳。

“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这些字眼正淡出公众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新市民”和“新居民”，称呼上的变化折射出城市管理理念的提升。今后，应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用日趋完善的制度环境和更亲切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李锦谈国企去杠杆①



编者按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备受关注的降低国企资产负债率，再次被摆到突出位置。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国有企业降杠杆、防范化解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的重要举措。降低国企杠杆率如何推进？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怎么约束？本报约请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详细解读。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64万亿元，负债总额106.6万亿元。经计算可得出国企负债率接近65%。这一数据尽管比2017年6月末65.6%的数字有所降低，但与国内企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高。

高杠杆控制不好，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去杠杆的重点仍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因此，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困境，约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成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这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

国企杠杆率较高，主要是产能过剩的行业杠杆率较高。换句话说，目前国企杠杆率较高的核心问题在于“坏杠杆”太多。国有企业为了发展，往往会通过贷款方式向银行借债，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用较小的权益资产支撑起较大的经营规模，由此产生了“杠杆效应”，也就是说高杠杆体现在高负债率上。

国企杠杆率居高不下，不仅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更会造成金融资源被大量低效、缺乏活力的企业甚至是“僵尸企业”占据，导致产能结构失衡。高效率民企及高新技术产业信贷则被挤压。这已经从产能过剩行业得到佐证。据统计，目前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行业是化工、煤炭和钢铁，这三个行业恰恰是产能过剩最严重、最需要改革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庞大且昂贵，企业类型多属于资本密集型，都具有高杠杆运行的性质。这些企业的负债率越高，意味着负债规模越大，经营风险也越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应成为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主要领域。

加强国企资产负债约束，需要狠抓结构性去杠杆这个关键，扭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着力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困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结构跟上需求变化，解决产能过剩和不足并存等状况，纠正各种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高资源配置水平。真正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问题，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容置疑的正确抉择。

（下篇请看《找准国企高负债的原因》）



全面围剿骚扰电话

史洪举

据报道，自4月份以来，宁波120接到的楼盘推销电话数量激增，最多时一天接到90多个，一个多月来累计多达1600余个。拨打骚扰电话的主要是4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建部门要求4家企业立即停止拨打营销电话，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以停止网签等处罚。

现实中，用户遭遇骚扰电话或短信的情况十分普遍，让人不胜其烦。这些骚扰电话有的是商家产品推销，也有违法犯罪分子实施的诈骗或恐吓。

更让人气愤的是，在遭遇电话骚扰后，很多用户投诉无门。在宁波120被推销电话骚扰事件中，工作人员屡次解释，依然无法将骚扰电话拒之门外。一些商家之所以有恃无恐，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太低。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屡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以拘留或者罚款，但骚扰到何种程度方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并无标准，而且这些骚扰电话来去无踪，难觅源头，很难追查。极低的查处概率和极小的违法成本，自然让骚扰电话难以根除。

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必须提高骚扰电话的违法成本。除了将相关企业列入黑名单、限制办理电信业务外，还要从根本上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恶意骚扰电话的立案标准，视情节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赋予被骚扰用户索赔权，在遭遇持续骚扰时，可向恶意骚扰者主张不低于一定金额的赔偿。只有明确相关法律标准，畅通用户维权渠道，才能让骚扰电话真正绝迹。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